



## 近代工业化进程中活跃的民间金融

朱荫贵

在最近的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中小企业资金困难，有些企业甚至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消息。与此同时，又不断出现民间“非法集资”、“地下钱庄”活动频繁，以至于放贷利率高企，不乏利率达50%甚至更高者。这种资金困局下，还催生了因企业资金链断裂，民间非法集资引发的各种问题。例如2011年10月14日人民网报道，温州市公安局已推出“坚决查处有债务危机的企业主和非法集资人员逃匿行为”等十项措施，并打击查处了八十多名暴力讨债、非法拘禁的不法分子，刑拘了二十七名非法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这还仅是温州一地，如果加上其他地方，情况显然会更加严重。这些现象从表面上看，凸显出来的是资金供求关系出现了困局，导致不法现象大量出现，但从深层次看，实际上还是提出了一个如何有效运用和监管民间金融的问题。

笔者长期从事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在接触史料的过程中，对近代经济发展与民间金融的关系方面，有一些发现和感想，

这里提出来，或许对今天金融改革和解决民间金融问题的思路能够有一些参考和借鉴作用。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过程中，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最大变化，是大机器工业的出现和发展。这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化的重要标志。但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有几个方面或者作为前提或者作为特点应当值得提出并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中国近代的开端和大机器工业的引进，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将国门打开条件下，为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而开始进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这种社会和经济的改革转化，是一种被迫和被动进行的活动。

其次，在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化的进程中，由于此前的中国缺乏资本原始积累，缺乏启动和发展工业化进程的资金，战争赔款和外国列强掠夺进一步导致国穷财尽，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因此在中国

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中，来自于政府的资金和财政支持实际上非常可怜。

第三，就在这种被迫被动进行特别是在政府支持力度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为止，中国近代工业依然有了不小的进展，特别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之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和白银时代。据统计，到1920年全国工厂已有24000多家，资本额7.4亿元。此后继续快速发展。据中国经济史前辈学者吴承明研究，如拿1936年与1920年相比，中国交通运输业的总产值增长了132.5%，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8.2%，工业总产值增长了79.1%，除农业外，增长情况都十分显著。在工业总产值中，属于近代工厂制造业的部分增长了220.6%，增速尤为明显（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表6~9，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9页）。

在这期间，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发展迅速，大多起步于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另一个特点是规模大，在各自的行业里都有相当影响。这些企业集团的资本增长速度都很快。旧中国号称“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荣家企业集团，1902年开始创办第一家面粉厂，1921年面粉厂就已从1家增加到12家，产量占到本国面粉厂产能的31.4%。纺纱厂从

1915年开始创办第一家工厂，到1931年已发展到9家工厂，蔚为壮观。荣家企业集团1923年全部企业自有资本为1041万元，可仅过10年，到1932年时就增加到2913万余元，较1923年时增加了179.8%（《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刘鸿生企业集团1920年创办第一家企业苏州鸿生火柴厂时投入资本只有12万元，此后历经十余年，到1931年时企业投资（包括公司股票、合资股份和船舶码头三项），已达740多万元（马伯煌：《刘鸿生的企业投资与经营》，载于《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另见《刘鸿生企业史料》“前言”）。

这些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崛起和发展，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标志和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典型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某些重要特点。但是，拿这些企业快速发展的现象与前面提到的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特点相对照时，却凸显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在一向被认为资本较为贫弱而观念又相对保守的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兴起和这些企业集团的快速发展之间，资本问题是关键问题。而这关键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特别是根据学者研究，银行业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时，这个问题就更加引人关注了。例如，1936年时，中国新式工业资本在不计算外国在华资本和东北地区的情况下，达到17.9亿元（吴



承明：《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但同期中国最重要的15家银行对中国工矿企业的放款总额仅占2.9亿元（李一翔：《中国近代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65页）。那么，中国近代新式工业资本形成的资金究竟是从什么来源和途径解决的？实际上，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时会发现，传统中国活跃的民间金融，是必须关注和无法忽视的重要领域，是中国近代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民间资本企业集团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这里，我们不妨举几个典型例子以作说明。

钱庄是传统中国代表性的金融机构，遍布全国各地，资本数量不大，进入的门槛也不高，只要有点钱且想开家钱庄的人基本都能实现愿望，并没有什么限制。但就是这种不起眼的民间金融机构，却为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筹措了不少资金，为中国近代工业化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设立的第一家资本主义大机器交通企业。由于招股困难，这家企业在主要依靠官方借款成立后，就不得不为筹措企业的营运资金而不断罗掘奔走。“万事开头难。”招商局成立后即面对拥有雄厚资本的英美轮船商的跌价竞争，在轮船招商局前三届资本分别只有47万、60万和68万，官

方借款为12万、13万和35万的情况下，钱庄的贷款却分别为47万（与私人合计）、61万和59万两。这些钱庄的贷款对招商局站稳脚跟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此后各年钱庄贷给招商局的钱款也“常有百余万两之多……”（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1年版，第177页）。

汉冶萍煤铁公司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钢铁煤炭联合企业。这家企业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集勘探、冶炼、销售于一身，“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为解决汉冶萍燃料至关重要，可谓汉冶萍生命线的萍乡煤矿的勘探和开发资金，就几乎完全依靠钱庄的融资支持。1898年萍乡煤矿成立，在成立及头几年的营运中，资本周转几乎全靠钱庄贷款：“开办之初，并未领有资本，起首用款，即皆贷之庄号。”一般人难以想象，像招商局和汉冶萍这样的大型新式工业企业，会向资本小、贷款期短的传统中国民间金融机构钱庄大量融资。不过这种现象在当时确实普遍存在，可以说在当时成立的新式工业企业中，几乎都可以看到钱庄贷款的记载。“当时，国家银行我们（笔者注：“我们”系指华中裕大华纺织企业集团）走不进门，私营钱庄是我们的主要往来。”（《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清末民初新式银行开设不多，亦不做商业往来。工商业资金融通完全依靠钱业。”（《上海钱庄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0页）分别处在湖北和上海的当时业内人所说的这些话，点出了钱庄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

不过，这时期钱庄向大机器工业的贷款具有这样的特点：就是一家大型企业中同时存在几十家钱庄的贷款，而一家钱庄同时又向多家企业贷款。而且为了方便地得到钱庄的融资，有不少企业还向钱庄投资，荣家企业就是如此。荣家企业的掌舵人荣宗敬就曾说，向钱庄“搭上1万股子，就可以用他们10万、20万的资金”。这种现象在华资银行数量增多和有所发展后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除了钱庄这样的民间金融机构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十分活跃外，中国近代民间金融活跃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企业商号可以直接面向社会吸收储蓄或曰融资。这种现象说来有些令现代人难以置信，但根据文献和研究，却是从宋朝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这种主要不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渠道借入资金，而是面向社会大众直接吸收存款，甚至发展出像银行一样的储蓄部，面向社会发放存折吸收社会零散资金以供企业作为营运资金的方法，一方面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金融特点的继承和延续，但另一方面，却也可说是近代中国民间金融活动极为活跃的重要表现之一。

到了20世纪，特别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当经历过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成长，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近代工商企业为自己寻求更大发展空间，对资金需求更加旺盛之时，这种吸收社会储蓄的传统也与时俱进，出现了此前未有的变化和新的特点。

在此之前，普通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长期以来均是规模不大的个体行为，也不打出旗号和广告面向社会公开招揽。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现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在这些新的改变中，通过报纸刊物等传媒手段刊登广告公开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鼓动，为自己招揽社会储蓄存款造势是前所未有的特点之一。当时王志莘在其所著《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一书中就特别指出：“我国商家如银楼绸庄粮铺典当等等，向多吸纳社会存款，以资营业上之运用周转，然都不公开招揽，系由相识戚友辗转介绍而来……其以公开广告方法吸收存户储蓄者，民国以来甚多……”（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发行，第319页）。以至于当时的金融中心“沪上储蓄机关之多竟自汗牛充栋”。成立专门的储蓄部揽储是又一特点。至于这些企业商号面向社会吸收储蓄的动机，荣家企业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可免受制于人、仰承金融资本家的鼻息”，“估计每年可节省利息支出二十万至三十万元”。荣家企业1928年成立同仁储蓄部，当年



就吸收到储蓄 147 万余元，以后逐年增加，1931 年达 467 万余元，1933 年增加到 521 万余元，与用旧式存折方式吸收的存款合计该年达到 754 万余元（《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76、277 页）。

除了民间金融机构钱庄的活跃，企业商号面向社会直接吸收储蓄外，近代大机器企业筹集资金快速发展的方式，还有发行内部公司债、公司存单和利转股，以及鼓励企业职工以分期方式购买公司股票等办法。但无论是以钱庄为首的传统金融机构对新式企业的放贷、企业商号面向社会直接吸收储蓄作为营运资金，还是企业内部的利转股，以及发行内部债券集资等手段和措施，显示出来的都是中国近代民间金融活跃的各种图景和表现形式。

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家本身缺乏资本原始积累，企业发展特别是民间企业获得政府的资金援助更是可望而不可

即，因而来自民间的多种筹资手段、多种积累扩张方式就是不可避免。民间金融的活跃，不管是历史长期传统的延续，还是近代机器大工业兴起后新产生的方式，都是这期间经济发展重要动力、活力的源泉之一，也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作出了明显贡献。

中国近代民间金融的活跃和对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我们不仅不应该忽视和忘记，更应该从中获取启发和借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今天，一方面，当今中国民间资金数量巨大，但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广大企业特别是民间中小企业对资金需求巨大，但缺乏融资渠道。如何把需求和供给这两方面有效衔接，把这些民间巨额资金纳入支持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轨道，同时政府又能有效进行监控和管理，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是重要的课题，也可以说是金融改革无法避免的领域。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